



责任编辑：吴键 蔡丽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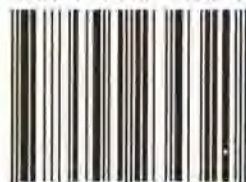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建设平面

# 宋词名篇解读

SONG CI MING PIAN JIE DU

- ◎ 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解读
- ◎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解读
- ◎ 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解读
- ◎ 陆游《真珠帘·羁游有感》解读
- ◎ 辛弃疾《贺新郎·老大那堪说》解读
- ◎ 姜夔《暗香·旧时月色》解读

ISBN 7-5442-3432-0



9 787544 234320 >



ISBN 7-5442-3432-0

定价 20.00元

# 宋词名篇解读

——两宋名词的微观研究

阮忠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6年·海口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宋词名篇解读：两宋名词的微观研究 / 阮忠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5  
ISBN 7-5442-3432-0

I. 宋... II. 阮... III. 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6309 号

## SONGCI MINGPIAN JIEDU 宋 词 名 篇 解 读

---

作 者 阮 忠  
责任编辑 吴 键 蔡丽玉  
封面设计 建设平面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出版) (0898)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口景鑫达印刷包装装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3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432-0  
定 价 20.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作者简介



阮忠，湖北黄陂人。现为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及中国散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歌、散文研究。著有《庄子创作论》、《汉赋艺术论》、《韩非子的人生哲学》、《唐宋诗风流别史》、《道家智谋》、《散文概说》、《两汉诗歌与传统文化》、《中古诗人群体及其诗风演化》。公开发表庄子研究、汉赋研究、两汉诗歌研究、中古诗人群体研究、古代文化与散文风格研究等系列论文九十余篇，另编著或参与编著图书二十多种。



## 自序

对于宋词，我素来有些偏爱。记得少时，偶尔读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印象最深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对其中的韵味却不甚了然，以后的许多年都是这样。那时节，我不曾问自己为什么，只知道周围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对宋词同样不甚了然却又同样的情有独钟。宋词，可以让我们不懂它而喜爱它，且经久不衰，足见它的巨大吸引力，尽管如是的还有其他古典诗文。

多年来，我时时羡慕当今在词学界把学问做得极棒且声名赫赫的朋友兆鹏兄和尊明兄。像们或在珞珈山上，或在沙湖之滨，游弋于姹紫嫣红、百花竞艳的词苑圃，咀嚼着词的英华，把词和自己的生活趣味融合在一起。我想，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人生境界啊，浸渍其间的人会因娱情适性，将多少辛苦都在这种境界中化解，变成别具一格的快乐与甜蜜。这应该是很美气的事情。

说起来，我进入学界之初，因工作上的分工，怀有对宋词的憧憬而迟迟不能窥其园圃。当我徜徉在宋词门墙之外的時候，我巴望，也知道会有叩宋词之门而入的一天。最初的叩击是桂子山赋予我的，在这块养育我的土地上，1994年的教学变革把沉浸在先唐文学中的我拉了出来，送进唐宋文学的圈子里，在阅读、吟咏、欣赏宋词的过程中，让我也能享受到兆鹏兄和尊明兄那样的愉悦。然后是2004年我在海南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获得讲授“宋词研究”的机像，使我人生的这种愉悦切实地得到



延续。

我曾经有撰写《唐宋词风流别史》的想法，至今完成的竟是这里的《宋词名篇解读》。对我来说，这里对两宋名词的选择是有限的，但这些词以它们的不同风貌告诉人们宋代词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告诉人们宋词艺术的独特风韵。我有意在解读所选的两宋名词之前，对宋词的发展轨迹作一番描述，让它引导亲爱的读者步入宋词的通幽曲径。而那一首首两宋名词，在两宋词的海洋里，不过是点滴的海水。但那点滴的海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映现出太阳多彩的光辉。这通常的道理意味着读者走进这些名词，会对它们的绚丽有自我的感受和体悟，从而对宋词的面貌有更多的认识。

当然，词是要读或说是要吟的，多读多吟是解词的必由之路。不过，我没有让读者单纯地读这些词，而是以“解读”的方式，努力以自己的认知和实证，把这些词的意蕴展开，更深入地传达我对这些词人及其词的理解和喜爱，传达宋词的艺术精神和炫目光焰。我在“后记”中记录了自己解词之际的心路历程，这是在有意识地告知读者我的一些想法，目的是通过读者对我解词思路的把握，增进读者对这些名词的理解。我很希望自己的理解有一孔之见，很希望自己的理解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使读者像我一样喜爱宋词。

也许我不需要企盼，因为两宋名词本身有着四射的魅力。

也许我仍然需要企盼，因为我的“解读”毕竟是我的“解读”，尽管我疼爱它。

阮忠

2006年3月6日



## 前 言

词有“诗余”一说，如此说的人自然是视词为诗的余绪，这一说法对词的轻视是存在的，但同时也蕴含了词是诗的发展。一般认为词产生于隋唐之际。隋运短浅，姑且不论。在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惟有晚唐，词才因温庭筠的出现有了兴盛的迹象。然而随后却是唐王朝的覆灭，五代相继，词的延续成为自然。于是有《花间集》问世，有南唐李氏君臣词名盛一时，直到南唐李后主成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阶下囚，南唐词也就成为历史。尽管南宋李清照作《论词》时才说出词别是一家，以音乐为标志把词与诗的界限划分开来，但在晚唐，词自为一体已是不争的事实。

北宋立国，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完成中央集权并开启了尚文娱世的社会风气，但足资娱乐的词居然在这个时候没有因势利导，蔚然兴盛。一时间很少有人热衷于词的创作，导致北宋初年即从北宋立国的960年到宋仁宗即位的1023年之间的六十余年，词坛一派冷清。这一点早就为人关注。南宋王灼就说过：“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国初平一字内，法度礼乐，寢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sup>①</sup>他对唐末文章的批评不过是仁智之见，而说北宋初年词坛的衰微则得到人们认同。他对词的衰落感到奇怪，让人

<sup>①</sup> 王灼. 碧鸡漫志. 卷二. 中华书局, 1991. 9



联想到文坛的现象，同时感到奇怪的是北宋初年诗歌与散文都有很大的发展。后人常道的北宋三体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诗各领一时的风骚，以“时文”为代表的散文风行一时。但好诗文的文人们以诗文为乐，却不以词为乐。那时，文人们对词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晚唐以来，词风华艳导致王朝衰微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对华艳之词有本能的排斥。二是诗文为科举所需而词不为科举所取，人们借助诗文可以进入仕途，而词没有这样的功能。人们很少提及沉寂期的北宋词，虽说这时的词人不过十儿人，词不过三四十首，但仍然可以看出词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人们对沉寂期词的轻忽是真的，所以一般说北宋词往往从晏殊、欧阳修等人开始。这当然有他们居时代之先的原因，但根本在于他们先后是那一时期的文坛领袖，在词的发展上，他们承袭了晚唐以来的柔婉风格。

本来词产生之初，并不以女性为专宠。晚唐以前，最具影响的词是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的《竹枝词》、张志和的《渔歌子》。他们状江南风光，说隐逸岁月，也不回避男女情恋，语言洒脱而有诗的韵味。再则有戴叔伦、韦应物同名词《调笑令》，写边塞生活，与词为艳科的传统说法实在是相距甚远。即使是相传为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表现旷妇的相思，也不以描写女性的娇媚见长。这一切延及晚唐的温庭筠有了很大的改变，温词成为艳词的标志。温庭筠的人品常为人讥评，但他文思的敏捷和创作的成就常为人称道。温庭筠的骈文与李商隐、段成式齐名，人称“三十六体”；他的诗歌与李商隐齐名，人称“温李”。他的词在当时则无人能及，至于成为“花间词派”的领袖那是后人的推举，与放浪散漫的温庭筠的人生期待是有所不同的。温庭筠的词以女性为表现对象，贯穿其中的是离别相思情怀，但在具体的表现上借重闺房的器物，女性的服饰、



容颜和慵懒的神态以及华美的言词，让人体味她们在孤独中有着怎样的痛苦。这在文学领域不是他的首创，南朝齐梁时期的宫体诗就是如此。同时，中唐以后，文人狎妓风盛，以女性入诗而娱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温庭筠不同于其他文人的是，他不仅以之人诗，而且以之人词。其后，这成为词的一种传统，于是才有了以他为首的连贯五代前后蜀的“花间词”派。

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请同一时期的词人欧阳炯作序。欧阳炯的词也入了《花间集》，他的骈体序对词的评说自然很值得注意。他对词的创作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构思的精巧和语言的华艳，“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二是韵律的和谐，“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和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三是柔婉，即“绮筵公子”作以花笺，“绣幌佳人”舞以玉指，拍按香檀而歌。这其实是“花间词”风格的理论总结，从而表现出这些词人创作的自觉性。不过，人们通常认为，“花间词”大体上存在两种风格，一是以温庭筠为首的香艳绮丽的词风，一是以前蜀韦庄为代表的清新疏淡的词风。其后以词相继的是南唐君臣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李璟之臣冯延巳。李璟的词今传甚少，李煜做了亡国奴后的苦思故国之词有他很大的特殊性，他以血书之，导致其后少有人能学得其词的风格。倒是冯延巳的词融合了温、韦的词风，影响到北宋词坛的晏殊和欧阳修。

晏、欧在政坛上声名显赫，晏殊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欧阳修则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们在政治上无大的建树，在学问之途则深受人们推重。晏、欧在词的创作上赏玩的心思很重，以词状女性的生活与情感。于是人们在他们的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延续传统的男女情恋、离愁别绪的一面，把缠绵的相思和柔婉的风格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并不新颖，人们从中看到了冯延巳词风的影响和发展。不过，他们没有始终保持词的脂



粉气息，而以词叙说自己的现实人生态度和情趣。晏殊的及时行乐、欧阳修的游颍州西湖，虽然说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暮年心态和生活状况，但带来了较之冯延巳词更为疏淡的风格，成为词坛的新面貌。同时，欧阳修还把当时文人狎妓的痕迹带进词中，使他在雅词之外有俗气甚浓的词，并遭到后人批评。

在词坛的晏、欧时期，张先值得一提。他年长于晏殊和欧阳修，却死在晏、欧之后。这个因写花絮之影而获得“张三影”称号的风流词人在北宋词坛上也有承前启后之功。清代陈廷焯认为他的词在北宋是处在古今之间，集古味、新意于一体。同时，词也不再是统归含蓄，也有了发越即激扬成分。张先在生活上比晏殊、欧阳修有更多的悠闲。他和晏、欧一样，不是着意于词的创新，而是以词率性表现“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行香子·舞雪歌云》）。同时，他比晏、欧更注意语言的锤炼，诸如“云破月来花弄影”之类，让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词的娱乐性一仍延续，稍晚于张先的晏殊第七子晏几道称自己的词为“自娱”。他在《小山词自序》中是这样说的：“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醒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皆叙其所怀，亦兼写一时杯酒闻见，及同游者意中事。”他的“自娱”并非纯粹的自我娱乐，囊括了自我情绪的排遣，用他的话来说，不仅要抒怀叙见，还要能够解酒息愤。晏几道对人生的不满意和他性情执拗、浪荡相关，但他又不是绝对的不好功名，在功名与享乐之间，他更多地选择了享乐，把自己的真性情形于词。虽然他的词和其父晏殊的词齐名，人称“二晏”，但他的词比晏殊的词有更多的感伤而不是晏殊享有的富贵闲情。其词的温柔蕴藉也胜于晏殊，“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拼得为花愁”（《鹧鸪天·守得莲开结伴游》）正是晏几道的写照。

说到这里，可见北宋词受传统词风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显得

有些另类的是范仲淹和王安石，他们也未尽脱传统，只是范仲淹以《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表现边塞风情，充满人生的悲凉，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怀古，表现对王朝兴亡的忧思或自我豪迈壮阔的人生精神，在这一时期无疑是词的新声。

北宋词的发展至柳永和苏轼是一个高峰。人们说到他们的词的时候，很称道他们在词发展上的贡献。柳永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专业词人，这与他好游乐及沉溺歌楼妓馆的生涯是分不开的。李清照曾说“变旧声，作新声”（《论词》），后人说他变小令为慢词。柳永本想借科考入仕途，不意天不遂人愿，使他长期在追欢买笑、浅斟低唱中消磨自己的时光，直到五十岁左右才中进士，所得不过是屯田员外郎这样的小官。而柳永在歌女群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歌女爱他的词名，并因能唱他的词而获得声望。柳永正是在这样的岁月里使自己的词熠熠闪光，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对词的体式和品格的改造。在词的体式上，柳永确立了慢词在词坛上的地位。本来在他之前，张先就有慢词之作，只是没有形成声势，柳永则使慢词得到扩展。宋翔凤是这样说的：“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睹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sup>①</sup>在词的品格上，本生于尊前、月下、花间而尚雅的词，经柳永真正开启了媚“俗”一格。这“俗”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sup>②</sup>所告知的流传广泛而合俗，使词此后雅俗并举，形成词坛新的审美观念和原则。苏轼不同于他，南

<sup>①</sup> 宋翔凤·乐府余论·见：词话丛编·第3册·中华书局，1986.2499

<sup>②</sup>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引·上海博古斋影印本，1982



宋刘辰翁曾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sup>①</sup>这对苏轼及其词都是很高的赞誉。所谓“倾荡磊落”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一生的品性，词如其人也是真的。而这如诗、如文之说，是在以诗、文的题材入词，是在以诗、文的笔法写词。这就极大地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方法，无事不可入词，无法不可写词，使词在与其他文体相融合的同时，足以独立于其他文体之外。这且不说，他在操持女郎所歌之词的同时，衍生出壮士所歌之词，把王安石、欧阳修词中的豪放因子放大，成为一种新型的词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豪放词风。相传苏轼常常把自己的词和柳永的词相提并论，很看重自己的词有别于柳词而“自是一家”。

欧阳修在主考苏轼之后，很欣赏苏轼的才华，表示要避开一条路让苏轼出人头地。他没有想到的是，苏轼因介入王安石、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争，遭“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命运之舟就一直在风口浪尖上抛洒，没有光明的前程。幸好苏轼在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崇拜者自不乏人，于是有了“苏门四学士”晁补之、黄庭坚、秦观和张耒。“苏门四学士”并不因词而著称，但他们都有词名世。甚至与苏轼同一时期的陈师道曾说秦观、黄庭坚的词冠绝一时，这的确抬高了秦观和黄庭坚在词坛上的地位。不过，秦观、黄庭坚以及晁补之、张耒的词都是写得很好的。他们的词在不同程度上受苏轼词的影响，尤其是晁补之，他与苏轼唱和的词，因仿效东坡词的痕迹太深可称为“东坡体”。而四学士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秦观词。

秦观原本好侠盛气，但在经历了类似于苏轼式的贬谪和柳永式的歌楼妓馆生活之后，性情刚毅的一面逐渐退化，有点化

---

<sup>①</sup>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见：徐汉明编，辛弃疾全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396

“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味道。况且他对人生没有信心去把握，或者说无能力把握，以至在迷茫中特别能够滋生人生凄苦感，相思离愁之下吟出的“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阮郎归·潇湘门外水平铺》），让人不忍卒读。但他的词以温情、细腻、含蓄见长，在北宋柔婉词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话说回来，秦观词中也有想豪放洒脱的时候，但他很容易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化解了，最终还是沦为婉约。与他同一时期的贺铸倒能在词里显扬自我的英雄豪气。贺铸生于武官世家，有羽人剑客之貌。其词中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真的是掷地铿然有声。不过，贺铸的词风还是以柔婉绮怨为主导。

词至秦观、贺铸已是北宋的晚期，这时词坛的辉煌不是他们创造的，而是只小他们几岁的周邦彦创造的。后人对周邦彦推崇备至，有人说他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并认为他重词的音律而开创了大晟词派，或说是格律词派。以后的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莫不步其后尘。周邦彦宦海浮沉，终感人生漂泊，但他对词有高超的艺术把握。他的词善于摹写物态，能够曲尽其妙；善于锤炼词的语言和意境，使词新颖灵动；善于运用音律，抑扬顿挫，音韵和谐；善于化俗为雅，以雅为俗，雅俗共赏，使他的词达到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同时，他不是一个超现实的词人，写景咏物、叙事怀古，最不能忘却的是人生的蹉跎、失意。而他不幸处在北宋末年，目睹北宋王朝正走向衰微而无可奈何，只能以词表达内心深沉的哀伤。在他悲苦地告别人世之后，“靖康之难”的钟声敲响，金人入侵，汴京陷落，宋徽宗、宋钦宗及后妃、诸王、公主等三千多人被押送金营，北宋灭亡。

宋室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这时候的大宋王朝只有半壁江山，社会形势造就了南宋初期的词人多是南渡词人，他们前期生活在北宋，后期生活在南宋。而南宋的和、战之争一直是朝



野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和生活态度。大体上，南宋高宗时的“绍兴和议”、孝宗时的“隆兴和议”、宁宗时的“嘉定和议”，构成了南宋王朝与金朝的关系史，其中蕴含了南宋抗金的失败与求和的屈辱。于是，它深刻地影响了李清照、朱敦儒、向子諲、陈与义、张元干等南渡词人及其后生于南宋、长于南宋的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史达祖等词人。南渡词人前期的安逸生活使他们对亲历的社会动乱、国家破败有刻骨铭心之痛，抗战恢复失地成为他们人生的基本精神。这也影响了以后的南宋词人们，他们把爱国情绪的表达和报国不能的悲愤交织在一起，铸造了各自深沉亢奋或忧郁哀伤的品格。

南渡词人中，身为女性的李清照特别为人关注。李清照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的英雄豪气在她的《论词》中有所体现，但与抗金复国没有什么关系。她在《论词》中对北宋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等重要词人的创作都有批评，并且明确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念，从音律上把词与诗分别开来，使词在理论上有了文体的独立。李清照的词是典型的柔婉之词，有很深的女性印记，多囿于自我的生活与情怀。她前期那少女的娇羞或少妇相思怀人之愁，以“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唤起人无尽的遐想。她后期因丈夫之死、家国破败，遭遇人生的苦难和孤独，词的悲凉凄婉使愁思倍显凝重，生活的无奈和绝望都在其中。相对来说，李清照词的创作视野和情绪表现都较为狭隘，不过其词的清新真淳和可触摸的“物是人非”的愁怀给了读者很多的感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李清照，她的词在爱国词人的抗金氛围中，多少有点不合大流，与她的诗情也有区别。

南渡的爱国词人不是有意识的词人群体，由于他们在词创作的题材、情绪取向和艺术追求上的差异，有的人视之为不同词派



的集合体。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就把他们主要分为慷慨悲壮的英雄豪杰词派和由感伤转入旷达的学苏派。前者有岳飞、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张元干、张孝祥等人，其中真正以词名世的是张元干和张孝祥，而生于1132年的张孝祥严格说来并不是南渡词人。后者有叶梦得、向子諲、陈与义、朱敦儒等人，他们有一致的思想情绪、相近的审美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是词派，但他们自身“词派”的意识很淡漠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词人中，岳飞、李纲、赵鼎、李光、胡铨是军事家或政治家，他们虽不免有艳词之作，但以词说时事也能显示军事家或政治家的本色。如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李纲的“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苏武令》），英雄之气直干云天。相形之下，尚文的词人则显得悲切，即使是说了“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的张元干，随之说出的是“遗恨琵琶旧语”（《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慷慨悲凉是有的，英雄之气却被自我的浓郁忧伤化解了。南渡词人往往如此，他们想效命沙场，但报国无门，只能说“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朱敦儒《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痛苦莫深。

南渡词人的这种情绪和词风在延续，从张孝祥、陆游一直到辛弃疾、陈亮。张孝祥那“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所表现的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岁月又是那样无情的流逝成为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们可以对和而不战的社会局面说“不”，但又只能停留在这之上而无所作为，最终沦为自我的悲吟。于是，以词言志、抒愤是词人不可避免的常套，慷慨不足、悲愤有余是词的通格，使词与诗走了同一条道路，陆游就是代表。这位在宋代作诗数量



最多的诗人，诗中把自我塑造成悲愤英雄，在他的词中得到了同样的表现。在这些词人中，后人最称道的是辛弃疾。

辛弃疾深怀英雄武略和强烈的抗金情绪，但在朝廷主和的大局下，才华无所施展，于是把一腔忠愤寄托于词。胡微元曾说辛弃疾：“其词十二卷，慷慨纵横，不可一世，才气俊迈，于倚声家为雄豪一派，世称苏、辛。”<sup>①</sup>南宋以后，人们把苏、辛并称有两个着眼点。一是认为两人在词坛上的成就相当，是宋词发展史上北宋与南宋的两座高峰。二是两人词的风格豪放，甚至有人称之为苏辛词派。其实苏轼和辛弃疾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心态有很大的差异，苏轼时北宋虽遭外族侵扰，使他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意愿，但那毕竟是外族在边境一带的侵扰，和辛弃疾在南宋生逢金人分裂江山，宰割山河是很不一样的。苏轼因新旧党争郁郁不得志和辛弃疾因朝廷主和而长期赋闲也不可等同视之。两人把不同的性情和胸怀形于词，即使人们认为辛弃疾深受苏轼词的影响而词风豪放，那豪放的内涵也是不同的。苏轼是士大夫式的处世旷达洒脱，辛弃疾则是英雄般的悲愤沉郁。所以辛弃疾的词迸放着没有能够得到充分表达的英雄精神，人生失落最根本的是“千古江山，英雄无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这样的时候，身为英雄的他承受着不尽的人生孤独。不过，辛弃疾也是传统词风的继承者，他仿效“花间词”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说明。不同的是，他有时在柔婉的词中别有寄托而限于单纯的男女情恋、离愁别绪；他同时受“江西诗派”以才学为诗风气的影响，以才学为词，在词中大量地使事用典，徐钊就说：“词至稼轩，经子百家，行间笔下，驱策如

<sup>①</sup> 胡微元，岁寒居词话，见：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4034